

朝向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未竟之路： 回應謝國雄

李宗榮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一、前言

謝國雄所著〈經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現象、重新概念化與另類可能〉一文（以下簡稱「謝文」），對筆者與林宗弘合編的《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進行評論跟提點；在學科日漸分化，學者間難有切磋辯難機會的當代學術環境中，謝教授慷慨為文，並提出許多指教，筆者忝為此書的編者與導論的作者之一，非常感謝。

從文章的性質來看，謝文不是一般尋常的書評。其主要評論的焦點並非本書的導論之外，由二十七位作者所完成的十八篇獨立的論文章節，而是針對筆者與林宗弘為介紹專書各個論文而合著的導論中的論點〈「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以下簡稱「導論」）。謝文的評論分為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謝文首先簡述本書貢獻，並在切磋的部分指陳筆者與林宗弘合著的導論中從大型企業的角度提及台灣的經濟「衰退」的說法，並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全貌；因為在中小企業的領域展現的可能是韌性、活力與創新。他進一步盤點本書所收納的各個章節，認為這些文章沒有充分支持導論中所謂「衰退論」的看法。接著謝文主張，並沒有所謂奇蹟與衰退的典範，也沒有典範的轉移；他認為兩位編者在針對典範這個概

念的處理以及解釋架構上有所缺失，並認為衰退的看法並非貫穿全書各章的適切主軸。在此鋪陳下，謝文在第二部分首先回顧了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幾種看法，並主要從代工生產與外包體系的研究取徑，提出有關「台灣奇蹟」的構成面向，並指出由於本書導論沒有對此議題進行正面檢視，因此研究者需要「重新概念化」並進行分析。隨後在第三部分，謝文援引「調節理論」關於歐美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的研究，並主張調節理論的分析架構能夠更適當地分析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第四部分藉此架構，謝文簡要提出台灣在「積累機制」與「調節模式」的特徵；之後於第五部分，據此重新檢視《未竟的奇蹟》書中各篇論文。最後於第六部分，謝文倡議了數個學者未來可以探討的面向；這些包含了重新檢視資本主義、從事文化議題的研究與進行實作經濟的討論等等。

總括而言，謝文的出發點在指出本書的導論中對於典範概念的使用有所缺漏，並據此進一步主張有更合適解讀台灣經濟發展的架構，目的在示範並宣稱這個「另類可能」的架構可以更有效地詮釋台灣的發展經驗。針對這些論點，本文認為，導論中對於典範概念的使用，的確有缺漏並值得商榷之處；不過筆者認為，對於典範語詞的常識性使用，並不因此否決在導論中所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在各個面向正面對挑戰的現實。如果從經濟發展所面對的挑戰的視野來解讀，《未竟的奇蹟》一書中絕大部分章節都與此有關，並非如謝文所宣稱大部分無關。即使我們重新檢驗關於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興衰或相對重要性，經驗證據的評斷可能仍有所分歧而未有定論；而導論一文中也並陳此辯論。謝文的替代性解釋提出一個本書所忽略的面向，但社會科學的典範下的不同取徑研究，就如同本書中的導論與不同章節所展現的一樣，其效力都可能是局部而片面的。此外，與謝文相對靜態看待台灣經濟發展分期差異的分析視角相比，筆者認為帶入研究問題意識轉移的視野，更可以趨近不同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最後，筆者從編輯《未竟的奇蹟》一書的過程與省思謝文的指教中反省台灣目前在有關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現況，並提出學術社群未來可以著力的

數個建議。以下章節將針對以上論點分別闡述。¹

二、《未竟的奇蹟》成書目的與「導論」的功能

謝文在第一部分中，認為導論針對典範這個概念的處理上有所缺失，並對於我們的「解釋架構」提出批評。雖然謝文目的不在點評《未竟的奇蹟》一書中全書其它章節所呈現的題旨，不過由於導論的構成奠基於整本專書的定位與成書的過程，因此仍有必要說明本書的出版背景跟編輯構想，以及重新指出專書論文導論的功能。

1990 年代之後，台灣歷經了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大轉型。然而關於這個轉變的過程至今台灣的發展現況，探討的熱度不若以往學界面對台灣經濟發展「奇蹟」時的蓬勃，在學術研究上也留下了很多待彌補的空白。《未竟的奇蹟》一書的出版目的，便是希冀彌補此空白，並以歷史的角度與社會學的取向來省視這個過程。本書的副標題——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事實上更貼切地反映了當初本書的規劃構想：紀錄在 1990 年代之後，台灣歷經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大轉型之後，經濟與社會相關的各個面向的現況。我們的參考座標，除了 1980 年代末的重要出版《壟斷與剝削》之外，也參考了近二十年來西方重要的經濟社會學專書的出版，同時並考察台灣目前學術社群中相關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就出版性質而言，《未竟的奇蹟》是一本有關台灣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專書論文集（edited volume）；而專書論文集通常是指一群具有相同興趣的學者，在主編的整合規劃下，針對一個共同的主題進行獨立而原創的學術寫作。之所以成為一本專書論文集的重要原因，是兩位編者考量到經濟社會學所涉及的議題繁多，

1 另外有關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發展的相對重要性的議題，林宗弘的回應文提供詳細的經驗數據的討論，筆者不另著墨。

探討這個大轉型的各個面向，勢必需要學術界的群策群力才有機會完成。最後的出版成書可以說反映了目前學術社群自然發展的集體成果。

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論文也都獨立成章，以單篇論文的範圍以及有限的提問進行論證。這些研究所橫跨的社會學領域有組織、產業、勞動、性別、人口、階層、發展、社會運動，甚至包含跨學科的管理學與經濟學等。不管在文獻脈絡與提問，甚至在研究方法的採用，也都顯現出性質殊異的特色。研究方法上兼含量化與質化研究；有些量化研究有較強的因果推論目的，有些則是傾向描述性的分析，有些則是歷史調查或文獻回顧，不一而足。而由於所採用的經驗分析單位（有官僚體制、產業、大型公司、小型家族企業、企業集團、工會組織、甚至是專利與發明人網絡等等）與研究樣本也都不一樣，因此每個研究的發現可進行推論的有效範圍也都不同。這意謂，不管是從成書的過程跟最後選錄的章節來看，《未竟的奇蹟》一書所包含的議題具有高度的選擇性（selective），而非在一個先驗理論的架構指導下完成。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本書也反映了一般社會科學發展因為專業化分工而局部化的現象。

作為專書的編者，在導論中自我定位的責任是介紹各個獨立章節的主要論點與發現，並將各個作者的貢獻置放在一個更廣的文獻發展的脈絡中來討論，同時嘗試勾串不同研究所產生的呼應對照或者矛盾辯論的面向。而由於不同章節所對話的理論脈絡不同，意謂著發展一個宏觀而統一的解釋架構恐不切實際，也難以在導論這樣性質的文章中完成。謝文在評論文章中，從我們針對主要章節所歸納的經驗面向，並強調這些面向是兩位編者的因果解釋架構，而責成其缺失，²

2 謝文認為，導論中設定台灣的經濟為何成長與衰退為依變項，而自變項是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分化。但他認為「導論單單區辨分析的層次，無法呈現台灣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組合其動力與矛盾從而無法解釋奇蹟或者未竟的奇蹟。」此外，謝文也指稱「兩位編者想要論證的是：各個自變項影響了依變項，從而解釋了台灣經濟由奇蹟到衰退的變化。但我們看到的只是列出這幾個自變項，與依變項並排，兩位編者從未進一步論證這些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更未說明本書各章論文的發現與依變項、自變項，

其實與兩位編者對於導論的定位與擔負的功能定位有很大的落差。事實上，正如專書的副標題以及我們在謝詞中所指明，本書的目的，是在探討台灣的經濟與社會於 1990 年代的所謂大轉型下，在各個面向所演變的結果，它毋寧是在調查與累積經驗研究的階段。筆者認為本書所呈現的各個面向的趨勢，以及我們在導論中嘗試勾勒的，是這些相關經驗現象的共變（concurrency），而非嚴謹的因果影響關係。筆者認為，要合理地評價本書有關社會學解釋架構的效力，應該回歸到本書各個獨立的實質研究章節。³

三、在奇蹟與衰退之外：導論中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詮釋與定位

前述謝文對於導論中分析架構的批評，主要與導論中關於「奇蹟」或「衰退」典範的使用有關。筆者承認從很多的層面來看，導論中使用典範的語詞方式過於寬泛而有值得斟酌之處。所謂奇蹟或者衰退的字詞，也正如謝文所提醒，接近常識性用語，而非嚴謹的學術概念。的確，如果以孔恩對於自然科學典範的研究作為參考，典範包含看待研究對象的世界觀的改變，以及一組在學術社群中取得共識的常態科學的構成；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中有關典範的使用確有再斟酌之虞。然而，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經常在不同的學科甚或理論傳統之

以及兩個之關係的可能連結」，且由於欠缺體制的概念，造成本書導論章的分析架構無法處理「社會因素即是自變項也是依變項的弔詭」。事實上，社會科學中關於經濟發展有關的重要因素，還包含有基本的生產要素的投入、人力資本（或教育）、制度完備程度、政治體制、社會資本、宗教、文化容忍度甚至智商條件、晚近的學者還考量地理因素以及透過家族傳遞的生物基因，以及不同地理區域人種的基因多樣性等因素的影響，都沒有在謝文協助從導論所歸納的架構中。過去近三十年來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主要是在控制了經濟學家所關心的解釋因素之後，探討例如制度、網絡、權力、文化……等等社會學因素的影響。

3 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以謝文所謂中等範圍的解釋架構提問跟分析，有數篇以量化數據為主的論文（例如林宗弘、胡伯維 2017；李宗榮 2017；鍾喜梅、詹淑婷 2017；熊瑞梅等 2017；呂玉瑕、林庭萱 2017；張晉芬 2017），對模型的設定跟因果機制有比較強的宣稱。

間存在著概念的轉介或模仿，甚至因為擴散而產生雷同或疊合，因此很難產生具有自然科學般的可清楚劃分的典範。⁴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將導論中典範的字詞限縮為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相關現象的歸納，筆者認為導論中所嘗試描繪的台灣經濟發展的特徵並非無效。如何從眾多的章節，並從晚近台灣經濟發展的現況中，找到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來勾串文章的主題，應該是所有相關的專書論文集編者都會遇到的難題。但筆者認為，本書的不同章節所回顧的相關文獻呈現明顯的趨勢，相較於過去二十年前的文獻，研究者已經從早期看到的台灣經濟發展榮景與成功，逐漸轉移至探究台灣社會在經濟發展相關的各個面向所遇到的困境與挑戰。以本書的標題所指涉的「奇蹟」為例，這個早年被國際學者所用以形容台灣經濟發展成果的字眼，指涉的是高度經濟發展與均富兩個重要面向。與 1980 年代學者刻畫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個成就相比，當今台灣經濟發展最深刻的特徵在經濟成長遲緩而貧富差距加大。晚近台灣社會從媒體到公部門等領域，對於台灣過去二十餘年來經濟發展普遍憂慮。導論以此面向作為現象的歸納架構，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呼應學術文獻上關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討論。《未竟的奇蹟》書中的章節事實上正反映了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前景的各種挑戰。例如發展型官僚能力的消退、經濟自由化所伴隨的大型企業的擴張與家族化、追逐相對低廉生產條件並移至海外與中國大陸生產的台商、透過網絡轉借的技術與日漸被追趕的科技優勢、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與長期停滯的薪資、中小企業持續的勞動剝削、因為威權統治歷史所導致的零碎化的勞工運動、改善中但仍然存在的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人口成長的停滯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隱憂、人口老化與福利負擔的世代正義

4 即使如此，社會科學研究者仍然大量使用典範一詞。隨機回顧社會學者使用典範概念的方式，筆者發現有學者以該詞指涉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例如新古典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的典範，cf. Swedberg et al. 1987），或者理論之間的比較（例如佛洛伊德典範），次領域之間的某種學派如世代典範，或研究方法之間的區別如變項典範（variable paradigm）（請參考 Abbott 2001）。從概念使用的嚴謹性來看，最後一種用法並不完全符合孔恩關於典範的定義，而接近學術工作者對於學術社群內部的常識性用語。

問題、外移至中國大陸的台商卻成為兩岸政治統戰的槓桿等等。藉著歸納這些現象的共變，可以協助研究者更了解台灣經濟發展遭逢困境的總體面貌；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並不同意謝文所指陳，本書的絕大部分章節與這個轉型挑戰的議題無關。晚近我們見到各種社會爭議與政治辯論皆圍繞著經濟議題，本書各個章節所討論種種彼此關聯的現象，事實上也是現今台灣社會不滿與政策爭議的潛在來源。

本書的書名《未竟的奇蹟》便是在這種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特徵的歸納之下所產生。所謂未竟之意，當然如謝文所指出，具有較強的倫理意涵；但這一方面投射了作為社會學者對於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理想憧憬（蓬勃的經濟發展與均富的社會），另一方面也有學術理論的範本參考。在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中，早年的學者認為過渡到所謂的後工業化社會，是一個成熟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必經之路（Bell 1976）；發展研究的核心議題則在探討發展社會如何從所謂高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成功克服經濟轉型與社會不滿的種種挑戰（林夏如 2019）。一旦對照這些概念的理念型，台灣是否已經進入了均富與經濟機會平等的後工業化社會，或者成功的跨出了高等收入陷阱的階段，仍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的提問。

事實上，筆者認為可能是基於不同研究學科典範的訓練差異，而導致謝文並不認同以研究視角的轉移的方式來檢視台灣經濟與社會所歷經的發展變化。⁵ 然而筆者認為，正是這種看待台灣經濟發展從過去探討發展成功的問題意識，逐漸轉移到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而能激發晚近許多逃脫舊視野的研究問題。這些不同層次的問題轉移的模式可以大致歸納成三種類型。首先是學術界面對社會公眾的意識改變所產生的研究問題意識的變化。例如，台灣過去數年來關於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經濟分配的果實是否能平均分配於一般受薪階層的身上（所謂薪資凍漲的爭議），便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在這樣的社會爭議

5 謝文不僅主張無所謂典範轉移，也認為研究者「僅需要有一個分析架構」（即調節理論）；該主張認為縱使台灣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展現不同的面貌，這其實是積累體制所產生的矛盾所致。

中，社會大眾對於經濟發展已經不僅僅看待經濟成長率，而更看重實質經濟果實分配的結果。晚近不少社會學與經濟學者探討例如薪資分配的議題或者經濟發展是否帶來工作的創造等等，便是呼應這種社會意識改變的顯著例子。⁶ 學者的分析焦點已經離開單純探討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而更對焦到經濟成長所可能帶來的矛盾面向。

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意識轉移，是既有的分析概念面對市場環境的自然變遷，造成的解釋機制的調整所引起。例如早期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中，普遍將家族企業視為促進台灣這種普遍以中小企業為主力的市場中一個重要的促進制度（Greenhalgh 1988; Hamilton 1996; 1997）。在這樣的文獻中，雖然家族企業具有內部自我剝削的特徵（因為過度動員家庭成員的勞動力，以及壓抑女性家族成員的勞動所得），但家族企業通常仍被視為能夠累積與動員資源，促進經濟起飛，並成為一般人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然而，晚近有關家族企業的研究卻從這種看待家族企業的樂觀圖像，逐漸轉而檢視家族企業的親信主義特質在企業經營上所可能帶來的弊病（Bennedsen et al. 2007; Chung and Luo 2013）；或者因為其容易尋租與累積政商關係，所造成市場寡占跟抑制市場的創新，進而拖累經濟發展而為市場與社會帶來負面的後果（Morck et al. 2005; Fogel 2006）。⁷ 而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不同見解，可能都說出了部分的事實；只不過反映了家族企業在不同市場發展時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與功能。制度經濟學者就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市場制度相對不完備的環境中，家族企業由強調內部信任，補充了市場效能相對不足的制度空隙（institutional void），而仍然能減低交易成本（Peng and Heath 1996）。顯然隨著

6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學者探討的是什麼樣的原因在經濟即使持續發展卻沒有相對帶動員工薪資的成長（林依玲、楊子霆 2017）；或者由單純的探討一般員工或高階經理人的薪資水準，而轉變到薪資差異（pay gap）與分配的情況。其他討論類似的矛盾現象還包括台商大陸投資的增加卻造成本地僱用情況的惡化（林宗弘 2015），以及房地產投資發展卻反而抑制創業動力的矛盾等等（李明軒等 forthcoming）。

7 根據 Kathy Fogel（2006）的研究，寡占家族企業控制市場環境越嚴重的地方，社會不平等程度越大，市場法治制度與基礎建設也越差，貪污情況越嚴重，經濟發展速度也較慢。

經濟發展階段的改變，家族企業在不同時期的研究文獻中的概念化，也逐漸由不完備市場的替代，成為市場寡占跟經濟成長遲緩，甚至造成社會不平等與階級形成的機制。

而最後一種研究意識的改變，則是理論典範的內在結構缺陷所導致，這其中與台灣的經濟研究相關最重要的例子可能是發展國家模型。台灣的發展國家模型，大概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改變，早期政治力量仍有強大治理市場的能力與資源，成就了所謂經濟發展的奇蹟（Amsden 1985），但隨著政治解嚴與經濟自由化，到 2000 年前後國家干預市場的力量已經大不如昔。發展國家理論，立基於國家自主性的前提，探討的是官僚如何駕馭市場並促進發展。這些除了反映在官僚的規範權力與政策工具，也展現在國家介入市場的組織機制與網絡的鑲嵌性等等（Evans 1995; Chibber 2002; 李宗榮 2007）。然而隨著國家權力沒落，市場開放並朝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發展，對應這個過程是官僚規劃能力的退化、推動與篩選適合的政策日益艱難（Wu 2007; Wong 2011），隨之而起的是企業權力逐漸凌駕國家的現象。雖然既有的發展社會學的文獻曾經提及國家扶植市場最後勢必帶來企業家或資本家的壯大，國家宛如馬克思所說的掘墓人（grave digger）一樣，會隨著民間資本的蓬勃而預示自己的衰弱或滅亡（Koo 1987; Evans 1992）。然而有趣的是，這個伏筆在發展國家理論相關的文獻已經鮮少有研究探討，有關市場治理的研究卻越來越多的文獻在逃脫此典範，並從不同角度的「轉向」來研究新的市場權力的問題（Evans 2004）。這些不同的轉向中，研究者可以探討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如何從西方市場社會移植到發展國家，而變成財經官僚普遍信仰的意識型態；⁸ 或從金權政治的面向，透過理解政治獻金的流向，討論資本主義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如何影響政治權力；而最後，也可能進一步把企業或資本家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內在構成是否有可

8 這是 Peter B. Evans (2004) 所謂的制度性的單一作物 (institutional monocropping) 的過程。台灣的相關研究見夏傳位 (2015)。

能結合成具有階級屬性的群體，強化其凝聚力與影響市場的政治權力（李宗榮 2016；2017）。

由國家的治理能力的分析，轉移到探討朝向「自我掘墓」過程的制度化原因，到政治權力如何受到資本的左右，再到資本家內部的可能凝聚力如何影響政治。在這樣的問題意識的轉移過程中，研究的前提已經有了重要的改變；政治權力從一個自外於金錢影響且獨立能掌控市場運作的實體，到成為資本能夠影響或取得影響管道的對象。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轉移下，原來發展國家理論的解釋機制已經無法有效的闡述；因為一個理論縱使如何具有解釋力，都無法以不存在的事物來解釋現象。在國家退位之後，既有國家官僚能夠直接指導企業的權力已經不如以往；政府因為大量民營化的舉措，使得政府掌有資源的組織槓桿也消逝。但重要的是，問題重要性的座標也已經位移。全球化科技競爭的市場日益複雜，原來官僚的獨立自主性及「高瞻遠矚的能力」在此環境中顯得捉襟見肘，而他們以新自由主義的各種主張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也越來越顯著。引起學者好奇的問題意識不再一樣，學者的理論裝備也從其他次領域的傳統中來轉借概念跟分析工具，變成了對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制度化分析，或是檢視企業影響政治權力的各種理論，甚或是關於資本家形成的階級分析等等。然而，不管是哪一種型態分析意識的改變，透過研究視角的改變與新理論工具的使用，學者可以更趨近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中具有現實重要性的新問題意識。

四、不同理論視角下的台灣發展經驗

謝文的另外一個重要部分，是嘗試以替代性的分析架構來討論台灣的發展經驗；謝文暗示，從調節學派所發展出來的分析架構，能帶來「一貫，適切，且更為深入的詮釋。」雖然謝文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架構，並以本書所提供的各個經驗章節作為材料，意欲證明其詮釋架構的有效性，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可能限於篇幅，謝文的這些詮

釋（在文章中的第五部分）僅止於條列與調節理論可能產生的概念關聯。這些不同的概念關聯是否彼此形成如謝文所強調的分析架構所應該具有的整體的構成，並有效貼合各篇文章原來的主旨，筆者無法加以評論，僅能從門外漢的角度針對謝文的分析詮釋架構提供幾點另類看法。

謝文的分析，主要是從調節理論的兩個重要的概念——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而來，而架構所本是調節學派對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福特主義，也就是二次戰後，以美國跟歐洲為主的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生產體制，並據以分析台灣的發展經驗。調節理論是一個源自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剝削理論以及資本積累邏輯的傳統，而衍生發展的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分析架構，以具有高度抽象的分析概念以及對長時段歷史變遷的分析詮釋為其特徵。其專長，正如謝文所顯示，是能夠闡明資本累積過程中所產生的價值創造、利潤發生的攫取與分配、以及這套生產體制所得以維繫的種種再生產的機制（或所謂的調節）的運作。然而這套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分析，卻有可能忽略了社會學其它的重要面向，甚或可能因為其具抽象分析的特質，而未能對於不同的市場背後的制度環境、組織型態等面向賦予適當的關注。

以謝文所舉的福特主義體制的產生為例，其主要特徵是相對和諧的集體談判、福利國家、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奠基於冷戰體制的美國全球政治霸權等等。而正如 Margaret Weir 與 Theda Skocpol (1985) 的分析所顯示，這個體制的建立，深受具有自身利益的國家官僚，以及政黨介入政治協商的程度所影響；其中 1930 年代羅斯福的新政是影響該體制的重要歷史遺產。雖然調節理論有可能將這個政治過程視為資本積累在遭遇危機與矛盾時，所產生的自我調節修正的結果，然而對於國家中心論者而言，這正是他們可能反駁的看法 (Skocpol 1980)；⁹ 因為國家的行動者具有自身利益與權力正當性的考量，並不總是與資本的邏輯一致 (Evans et al. 1985)。此外，

9 台灣的經濟發展正是早期國家中心論者的一個重要原型 (Amsden 1985)。

許多關於美國企業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研究也指出，福特主義所賴以維繫的大型企業體制的興起，受到國家政策與公司法等制度規範，是在種種「社會化」的政治過程下產生，並不全然只是資本累積的邏輯所導致（Fligstein 1990; Roy 1997; Freeland 2001）。從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科學角度來看，調節理論對於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並不見得就能對美國黃金時代的資本主義分析達到全稱性的理解，但透過不同社會學次領域的研究，或能對這個過程達到適當的補充。

而福特主義的體制基本上是一個成熟發達的資本主義，就歷史而言，位處於美國社會由傳統家族資本主義發展至後工業社會（或管理人資本主義）的階段。然而，如果從企業的治理結構的特徵來看，台灣的市場在所有權層次上有很大一部分還存有美國 1930 年代的家族資本主義的特色（Mizruchi 1982; Hamilton 1997; Luo and Chung 2005; 李宗榮 2017），與福特主義背後的後工業化體制顯然不同。在這種 Maurice Zeitlins（1974）所謂的古典資本主義時期，家族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與調節模式，是否仍可以用福特主義的模式素樸地套用仍值得商榷。此外，資本積累的分析也可能因此忽略了掌控組織的企業菁英的角色（Glasberg and Schwartz 1983）。以謝文所提及的台灣勞工長期的低薪問題而言，除了從累積體制的角度來解釋，從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等治理的角度，也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釋。例如，在家族企業與專業經理人主導的企業，薪資與利潤分配的機制會因為企業菁英的型態差異恐有不同（Zeitlin 1974）。就階級權力的角度來看，家族企業主更傾向將利潤留於自身家族成員，而對於勞工恐不盡如此，進而容易造成不公的分配。而在專業經理人的公司，則因為功績主義強調平等的作用，或有可能相反，企業利潤的分配有可能更為平等。¹⁰

10 此外，在有關薪資（或勞動價值的剝削）議題的解釋，市場的積累邏輯與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有可能是彼此獨立運作且互相強化的關係。Neil Fligstein and Taekjin Shin（2007）的研究指出，在美國市場高度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時代，為了更符合市場對於公司短期財務獲利的需要，大型企業的執行長紛紛被財務背景出身的經理人所取代。在這種財務主管為執行長的企業中，一般員工的薪資條件普遍較低（Shin

以上的討論並非主張謝文以調節理論分析台灣發展經驗沒有效力。筆者認為謝文的分析為本書眾多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被忽略的觀點。然而，在經濟社會學龐大的文獻與眾多的理論典範的學科中，正如同本書的所有章節，都可能是有限的解釋或詮釋了局部的現象。這也意涵著不同學科發展之間所形成的鴻溝，可以由不同視角的學術傳統彼此補充，以獲得更完整的理解。

五、結語： 台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未竟之路

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中，經濟生活與不同的社會層面息息相關，這也使得經濟社會學的涵括範圍極廣，幾乎重要的學科次領域都可能成為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以經濟社會學手冊的章節為例（Smelser and Swedberg 2005），接近三十餘個經驗研究主題，其中所孕生的理論架構為數眾多。這意味，每個經濟社會學次領域裡的某種理論角度，都可能只是這個學科裡面一個局部的視角。然而在學科或理論傳統的壁壘中，學者通常只能在不同研究的典範或次領域之內，進行有限範圍的對話。《未竟的奇蹟》一書反映的是台灣不同研究領域的經濟社會學者的集體成果。該書導論也不在為全書不同的研究發現下一個全稱式的解釋，而僅在對這些研究進行經驗歸納，並從作者主觀的視野，提供讀者一個參考的閱讀座標。該書的視野既不是全面，導論中兩位編者用以形構主題的角度更是選擇性的。其缺漏處受到了謝文的責成，相信未來還有可能受到來自更多不同角度的學術批評。然而，錯誤的假設比模稜兩可的宣稱更能帶領學科的進步，¹¹因為其提供了後來的研究者能夠清楚否證與累積證據的參考點；而等

2014; Davis and Kim 2015)。

11 “For a social theorist ignorance is more excusable than vagueness. Other investigators can easily show that I am wrong if I am sufficiently precise.” (Stinchcombe 1968: 6)

待被否決，更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精神。作為一個學術社群的公共財，《未竟的奇蹟》書中的論點當然值得學者進一步檢視。以經濟發展的困境、挑戰的面貌作為導論的主軸是否合適，見仁見智；然而這個以經濟轉型或階段發展的概念作為歸納的架構，從文獻發展的脈絡與理論問題的提問，甚至是激發未來的研究線索，筆者認為仍是個有效的參考。

然而，謝文的評論針對《未竟的奇蹟》一書的出版所引起的討論，也帶出了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未來台灣經濟社會學需要什麼樣的研究進程？筆者希望於此拋磚引玉，提供幾個粗糙的看法。

首先，筆者認為學者應該嘗試把研究問題意識的變化帶進分析的視野。《未竟的奇蹟》當初出版的目的之一，便是在描繪與紀錄從 1980 年代末解嚴後台灣市場環境的大變遷。相對於前述謝文強調以單一理論架構來分析台灣經濟環境變遷的主張，筆者認為如果帶入「問題意識轉移」的視角（如前述筆者觀察到導致目前文獻發展中問題轉移的幾種類型），學者的研究有可能產生新線索，透過不同的理論視野的指引，或許更能趨近不同經濟發展時期的重要問題。

謝文的指教與饒富創意的分析示範，展現了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兩難：社會科學的進步發展是由觀念的差異化與知識的共識，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力量所促成；理論典範的差異化刺激創意與新的見解，而跨典範之間的共識則讓累積跟整合性的合作得以可能。學術研究者縱使希冀取得共識以推進學科進步，然而在零碎且差異甚巨的不同常態科學的區域化限制中，共識卻通常難以取得。《未竟的奇蹟》一書在這種本地學術界自然發展的前提條件下成書，自然反映了這個情況。特別是，台灣作為一個後進且受學術殖民的國家，學科的訓練深受西方理論與視野的移植，而且因為相對狹小的學術社群，無可避免更帶來了學科的零碎化，讓學術共識形成與累積更顯困難（黃樹仁 2007；Abbott 2001）。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在台灣是一個歷經繁花盛開而眾聲喧嘩的精彩學科，然而如果要進行可以累積的辯論，除了持續深化各自典範的分析視角之外，學者未來應該嘗試建立不同典範間可

以互相有效對話的共識。筆者認為，未來的經濟社會學社群應該持續累積盤點台灣經濟社會學相關的研究議題，並朝著產生經驗上可以互相比較的基礎來發展。經驗上可以互相比較，意謂著學者間具有共享且認可的概念語彙，可以被清楚指涉推論範圍的經驗對象或樣本，一致的測量、可以合理客觀評價的分析方法、甚至是具有共識的分析模型設定。在這種情況下，辯論或累積才容易有客觀的根據。¹²

有關理論概念的共識形成，筆者特別同意謝文所倡議，台灣的經濟社會學研究應該把資本主義等經典的研究與問題意識重新帶回分析視角中。台灣深受西方移植的學術環境，許多根本而古典的議題，很容易在學術流行的潮流中被忽略。重新省視資本主義，一方面遵循古典社會學家的腳步，回到古典經濟社會學的提問（Parsons and Smelser 1957），另一方面也能夠對於西方相關的研究與基本的類型進行本地經驗的檢證，解決台灣經濟發展分期與發展階段的困惑。特別是在有關資本主義進程的角度上，西方的文獻發展了許多作為斷代分期標準的觀念，從家族資本主義，到後工業社會與管理人資本主義，到投資者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等等，不一而足。¹³ 學者也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是否已經過度到這些典範模型，產生具有理論意義的辯論（Zeitlin 1974）。台灣在戰後至今歷經快速工業化的進程，發展至今已超過半世紀，而在快速的環境變遷與市場轉型的現

12 例如謝文所提出對於衰退概念的質疑；然而如何定義衰退或發展，可能涉及到如何評估不同層面的廠商績效，而不同學者對於績效的定義可能也有不同的主張（Meyer 1994）。謝文所提出關於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何者孰重的議題，一個簡單的解決方式是透過完整的廠商的普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來檢證。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針對 2011 年台灣工商普查的數據分析（吳惠林等 2014），與中小企業相較，台灣大型企業的平均受僱員工生產額明顯較高，其投入研發的金額也較多，製造業大型企業之外銷比率與國際化程度明顯高於中小企業；但中小企業與微型企業之平均受僱員工營業利潤，在多數行業相較於大型企業有較佳表現。

13 許多主要是組織社會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提出探討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各種不同的概念，例如前述 Daniel Bell 關於後工業化社會的研究。重要的分析還有 Michael Useem 一系列從家族資本主義到管理人資本主義，以及對於所謂投資人資本主義（investor capitalism）的研究（Useem 1984; 1996）。另外 Gerald F. Davies（2009）探討歷經金融化過程的美國社會有關股東資本主義，或者金融資本主義對於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影響。晚近的經濟社會學者把資本主義的議題帶入分析視野中的專書論文集請見（Nee and Swedberg 2005; 2007）。另見李宗榮（2017）。

在，其具體的形貌與適合定義的理論架構為何，學界恐仍然沒有定論（Lee and Hsiao 2014）。檢視這些不同模型在台灣的適用性或许能提供學者對於台灣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性質以及動態分期的認識，進而更細緻地了解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¹⁴

《未竟的奇蹟》提供本地的學者一個比較大的經驗材料規模，也許可以讓學者在不同的典範裡評估不同理論命題的效力，甚至推敲複雜交錯的經驗現象共變背後可能的關聯與適當的解釋機制。而朝向去綜合評估不同的理論說法的相對貢獻與限制，是本書的編輯與出版過程中未完成的任務。作為一個編者，筆者感謝謝文提供了重新使用這些經驗材料，並進行另類分析的示範。然而筆者認為，為使得不同理論見解與辯論之間有更好的基礎，學者應該考慮從一個更廣的面向，嘗試在可比較的經驗分析平台上，對於來自不同傳統的理論主張，進行一致性的經驗測試，以了解不同競爭命題的相對效力。以台灣為對象的經濟社會學研究，過去學者主張過的理論見解繁多，不可勝數。我們雖然不需要「再發明輪子」（reinventing the wheels），然而本地的學者仍然有必要重新確認移植概念分析本地現象的適用性。¹⁵ 限縮在局部但重要且可以操作化的經驗現象，進行方法上可行，而因果解釋設定較為緊密的驗證，研究者如果再透過多重經驗指標的反覆肯證，最終或能夠對於相關的現象有較具信心的解釋跟推論。這最終或許可以比較適當的回應謝文所觸及的根本問題：什麼樣的理論模型或社會學的分析架構更適合分析台灣的經濟發展？

14 例如在職業與僱傭層次上，台灣可能符合後工業化社會模型的預測（林宗弘 2009），然而，在企業所有權與菁英構成的層次上可能還仍然未及（李宗榮 2011；2017）。

15 此類的例子有 Neil Fligstein and Peter Brantley（1992）對美國經濟組織的所有權的研究。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1988）將有關東亞與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理論歸納為自由市場理論、文化論與權威結構理論三種（另見 Orrù et al. 1997）。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1988）將解釋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理論歸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三大體系，其在跨國、國家與地區內的不同範疇又衍生出十一種不同的解釋典範（見該書第二章）；該書沒有明確宣稱最適合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解釋架構為何。另外從市場論、階級論以及制度論的不同角度來檢視台灣企業組織的親屬關係的研究，可參考拙作（李宗榮 2011）。

參考文獻

- 吳惠林、彭素玲、吳淑妍，2014，〈由工商普查資料看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特色與變遷趨勢〉。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計畫（<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52161140450ZT9Z70G.pdf>）。
- 呂玉瑕、林庭萱，2017，〈台灣經濟轉型中小型家庭企業的夫妻夥伴關係與性別動力：女性賦權的探討〉。頁 383-42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探〉。《台灣社會學》13: 173-242。
- ，2011，〈台灣企業集團間親屬網絡的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學刊》46: 115-166。
- ，2016，〈企業權力與民主：台灣企業集團 2008 年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分析〉。《台灣社會學》31: 99-139。
- ，2017，〈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鞏固〉。頁 313-34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宗榮、林宗弘，2017，〈「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頁 1-43，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明軒、陳釗而、劉孟奇，forthcoming，〈我國房地產價格波動對於創業活動的影響之研究〉。
- 林依伶、楊子霆，2017，〈經濟成長、薪資停滯？初探台灣實質薪資與勞動生產力成長脫勾之成因〉。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學術研討論文，第 17-A012 號（[http://www.econ.sinica.edu.tw/UpFiles/2013092817175327692/Seminar_PDF2013093010102890633/17-A0012\(all\).pdf](http://www.econ.sinica.edu.tw/UpFiles/2013092817175327692/Seminar_PDF2013093010102890633/17-A0012(all).pdf)）。
-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台灣社會學刊》43: 93-158。
- ，2015，〈台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 45-68。
- 林宗弘、胡伯維，2017，〈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頁 229-266，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林夏如，2019，〈後記：台灣的「高收入陷阱」與新南向政策〉。頁 299-310，收入《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難》。台北：商周。
- 夏傳位，2015，《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晉芬，2017，〈性別平等了嗎？男性和女性受僱者薪資差距解析〉。頁 159-18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 117-180。
- 熊瑞梅、陳冠榮、官逸人，2017，〈紅色跨界創新網絡的機制：以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為例〉。頁 495-540，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鍾喜梅、詹淑婷，2017，〈台灣家族集團股權結構的變遷：制度環境與組織擴張的影響〉。頁 267-311，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Abbott, Andrew.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msden, Alice 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78-106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aniel.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nnedsen, Morten, Kasper Meisner Nielsen, Francisco Perez-Gonzalez, and Daniel Wolfenzon. 2007. "Inside the Family Firm: The Role of Families in Succession Decisions and Perform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647-691.
- Chibber, Vivek. 2002.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4): 951-989.
- Chung, Chi-nien and Xiaowei Rose Luo. 2013.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uccessor Origi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egitimac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 338-357.
- Davis, Gerald F. 2009.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Gerald F. and Suntae Kim. 2015.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203-21.
- Evans, Peter B. 1992.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s,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Pp. 139-181 i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 Adjustment*, edited by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4.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4): 30-52.
-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and Peter Brantley. 1992. “Bank Control, Owner Control, or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ho Controls the Large Modern Corpo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2): 280-307.
- Fligstein, Neil and Taekjin Shin. 2007. “Shareholder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Economy 1984-2000.” *Sociological Forum* 22(4): 399-424.
- Fogel, Kathy. 2006. “Oligarchic Family Control, Social Economic Outcomes,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5): 603-622.
- Freeland, Robert F. 2001.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t General Motors, 1924-1970*.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berg, Davita Silfen and Michael Schwartz. 1983.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311-332.
- Greenhalgh, Susan. 1988. “Families and Network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224-245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ited by 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 Hamilton, Gary G. 1996.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ommerce: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Pp. 43-57 in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edited by Gary G. Hamilt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 1997. “Organization and Market Processes in Taiwan’s Capitalist Economy.” Pp. 237-295 i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edited by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milton, Gary G.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S52-S94.
- Koo, Hagen. 1987.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p. 165-181,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ited by Frederic C. Dey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ee, Zong-rong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2014. “Taiwan: SME-Oriented Capitalism in Transition.” Pp. 236-257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sian Business Systems*, edited by Michael A. Witt and Gordon Red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o, Xiaowei and Chi-nien Chung. 2005. “Keeping It All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Group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 404-439.
- Meyer, Marshall W. 1994. “Measuring Performance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p. 556-578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zruchi, Mark S. 1982. *The American Corporate Network: 1904-1974*.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orck, Randall, Daniel Wolfenzon, and Bernard Yeung. 2005.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Entrench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3): 655-720.
- Nee, Victo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200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On Capit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rù, Marco,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1997.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arsons, Talcott and Neil J. Smelser. 1957.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Peng, Mike W. and Peggy Sue Heath. 1996.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2): 492-528.
- Roy, William G. 1997. *Socializing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in, Taekjin. 2014. “Explaining Pay Disparities between Top Executives and

- Nonexecutive Employees: A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Approach.” *Social Forces* 92(4): 1339-1372.
- Skocpol, Theda. 1980. “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 *Politics & Society* 10(2): 155-201.
- Smelser, Neil J. and Richard Swedberg. 2005.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Ulf Himmelstrand, and Göran Brulin. 1987.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emises and Promises.” *Theory and Society* 16(2): 169-213.
-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Investor Capitalism: How Money Managers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r, Margaret and Theda Skocpol. 1985.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7-163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A. and Susan Greenhalgh. 1988.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Armonk, N.Y.: M. E. Sharpe.
- Wong, Joseph. 2011. *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Yu-shan. 2007.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47(6): 977-1001.
- Zeitlin, Maurice.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5): 1073-1119.